

鎏金铜蚕：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中的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刘莹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本文以 1984 年陕西石泉县出土的西汉鎏金铜蚕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分析与博物馆民族志调查，探究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转换。该文物为西汉贵族陪葬品，实证了汉代陕西关中桑蚕业高度发达，佐证关中是丝路丝织业发源地，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文化符号。在汉代农桑政策与民众生生不息的信仰加持下，它成为承载时代内涵的文化载体。步入当代，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其内涵再度更新，成为新时代丝路标志性符号。鎏金铜蚕在不同语境下，持续联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时代主题。这充分印证，历史文物不仅是过往历史的见证者，更能持续参与各时代的文化建构，具备不断生成全新价值的生命力。

关键词：鎏金铜蚕；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象征意义

The Gilt-Bronze Silkworm: Cultural Symbol and Its Symbolic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Silk Road Cultural Exchange

Liu Y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Xinjiang Urumqi 830017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gilt-bronze silkworm unearthed in Shiq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in 1984 as its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textual analysis with museum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of this artifact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s a burial object of a Western Han aristocrat, this artifact empirically attests to the highly developed sericulture industry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of Shaanxi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supports the view that Guanzhong was the birthplace of silk weaving along the Silk Road, making it a core cultural symbol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Endowed with the Han dynasty's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populace's enduring beliefs in life and vitality, it became a cultural vehicle carrying the connotations of its era.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s meaning has been renewed once again, transforming it into an iconic symbol of the new Silk Road.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 the gilt-bronze silkworm continues to connect with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 such as the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s and integration. This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historical artifacts are not merely witnesses to the past; they also persistently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ach era, possessing a vitality capable of continuously generating new values.

Keywords: Gilt-bronze silkworm; Silk roa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ymbolic meaning

0 引言

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是主要的高端贸易品，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的深入交流。从史前到汉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丝绸生产的国家，汉代长安因发达的丝织业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1984 年陕西石泉县出土的西汉鎏金铜蚕形制完整、造型精美，是国内第一次发现的同类文物，证明了汉代关中、汉中地区蚕桑产业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发展，繁荣了丝绸之路的贸易，既是古丝绸之路的文化标志，也在新时代“一带一路”语境中被不断赋予全新内涵。

本文在民族学、人类学语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主要研究文物的再语境化以及它的意义流动过程。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第一是分析鎏金铜蚕由实用器具变为祭祀、陪葬礼器的过程，并解释它所蕴含的汉代农桑国策和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第二是从文物入手，再现秦汉时期丝织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第三部分是对古今语境变化的梳理，解释了它怎样由丝路贸易遗存变成新时代丝路精神载体的意义重构过程。通过探究文物背后的文化记忆与社会认同机制，为丝路文化研究与“一带一路”文明交流提

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历史借鉴。

1 汉墓中鎏金铜蚕陪葬的象征意义

1.1 亲蚕礼俗与农业信仰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男耕女织”是其特点。封建国家把纺织与耕田同等对待,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与皇帝“亲耕礼”同样重要的皇后“亲蚕礼”,是国家农本政策的重要表现。亲蚕礼是由皇后所主持,率领众嫔妃祭拜蚕神嫫祖、并采桑喂蚕,以鼓励国人勤于纺织的礼仪,和由皇帝所主持的亲耕礼相对。透过这样的仪式,不但有奖励农桑之意,也清楚界定男耕女织的工作区分。到了汉代,亲蚕礼进一步制度化。汉武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蚕桑业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亲蚕礼被赋予了更高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亲蚕礼的仪式繁复而庄重,通常包括祭祀、躬桑、养蚕、缂丝等环节。仪式开始前,皇后需斋戒三日,以示虔诚。祭祀当天,皇后身着朝服,由仪仗队护送至先蚕坛,举行祭拜蚕神的仪式。之后,皇后亲自采摘桑叶,并将其喂给蚕虫,随后观察蚕的生长情况。若蚕虫顺利孵化,则继续举行“躬桑礼”,即采摘更多的桑叶,并将这些蚕茧中品质最好的献给皇帝。整个仪式不仅体现了对蚕桑生产的尊重,也象征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亲蚕礼的内涵丰富,它既是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是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古代社会,蚕桑业是重要的经济支柱,蚕被视为带来财富和福祉的灵物。因此,亲蚕礼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体现了对自然、祖先和劳动的崇敬。

亲蚕礼本质上也是具有农业信仰的,体现了对自然和农业生产的敬畏与重视。在亲蚕礼中,蚕神被视为保佑蚕桑丰收的神灵,皇后通过祭祀蚕神,祈求蚕桑业的繁荣,这与农业信仰中对神灵的崇拜是一致的。此外,亲蚕礼还体现了农业信仰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农业生产离不开自然的庇佑。因此,亲蚕礼通过仪式化的方式,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亲蚕礼中,也贯穿于整个农业信仰体系。

1.2 墓中随葬铜蚕的实质

古代设有皇帝“亲耕礼”与皇后“亲蚕礼”,旨在示范天下、推崇耕织,倡导百姓男耕女织,稳固农耕经济根基。西汉大力推行全国性农桑政策,陕西石泉县出土的鎏金铜蚕,正是汉代国家农桑政策落地地方的关键实物佐证^[1]。

以蚕随葬的礼制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当时贵族墓葬多随葬玉蚕,寄托了对农业丰收的美好祈愿。秦代秦始皇陵出土的金银蚕,标志着蚕桑崇拜正式升级为国家级礼仪制度。汉代延续并升华这一传统,石泉鎏金铜蚕材质珍贵、造型写实精细,蚕身节段、蚕足及吐丝姿态栩栩如生,是专属地方贵族与官员的高规格陪葬礼器,绝非民间普通器物。这一随葬形式既呼应了皇家“亲蚕礼”,也体现出汉代上层阶层积极响应国家重农政策,契合汉代丧葬文化中陪葬品贴合逝者身份、顺应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核心观念。

同时,鎏金铜蚕承载着汉代独特的生死信仰与精神内涵。古人观察到蚕卵、幼虫、结茧、化蛾的循环生长过程,将其视作死而复生、生生不息的象征,与古人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的信仰高度契合。汉代神仙思想与黄老学说盛行,推崇“羽化登仙”的生死观,认为灵魂可如蚕蜕茧一般脱离肉身、飞升成仙。墓葬陪葬鎏金铜蚕,不仅是对现世农桑经济的映照,更寄托了护佑逝者灵魂、助力重生永生的美好愿景,绵长的蚕丝也被赋予了灵魂永续、超脱世俗的特殊寓意,成为汉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精神载体。

综上,石泉鎏金铜蚕作为汉代贵族陪葬品,价值极为丰富。它直观印证了汉代农桑政策的全面推行与高超的丝织工艺水平,证明汉代陕南地区蚕桑产业规模成熟,大概率是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丝绸货源地。这一发现为张骞出使西域的丝绸贸易提供了产地依据,也为丝绸之路起源研究补充了全新实物佐证,是见证汉代农桑发展与丝路物质文明交流的重要历史坐标^[2]。

2 古丝绸之路历史语境下的鎏金铜蚕

2.1 养蚕缂丝: 生计与技术

丝绸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物产,深刻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古代中西交通亦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丝绸之路由此得名,丝绸也成为古代西方认知中国的核心载体。丝路繁荣的核心根基,是关中地区高度发达的丝织业,而鎏金铜蚕出土地石泉县,自古便是陕南重要的蚕桑核心产区。该地气候适宜蚕桑养殖,栽桑养蚕历史可追溯至西周,秦时朝廷推行奖励耕织政策,大力扶持蚕丝产业。诸多史料与出土文物均佐证,包括石泉在内的安康地区,数千年来蚕桑生产绵延不绝、技艺成熟^[3]。

汉代蚕桑产业依托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稳步发展,养蚕、缂丝工序精细规范,已具备规模化生产高品质生丝的能力。丝绸贸易的高额利润,促使汉代朝廷专设“织室”“服官”管理丝织生产,并以丝绸充抵赋税,大幅提升了蚕桑业的经济地位。汉代丝织业发展抵达顶峰,大

量优质丝织品经由丝绸之路远销西域,在欧亚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养蚕风气盛行与鎏金工艺的成熟,也为鎏金铜蚕作为纪念器物与贵族殉葬品的出现,提供了产业与工艺基础^[3]。

丝绸技术沿丝路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跨地域、多民族的创新发展。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国求取中原蚕种与丝织技术后,结合本地特色改良工艺,创制出独树一帜的艾德莱斯绸,成为丝路多元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4]。这一现象印证了文化传播的核心规律:文化特质在跨地域传播中,会被接收族群重新诠释、创新发展。

整体而言,桑蚕缫丝不仅是古代中原核心生计产业,凝聚着黄河、长江流域农耕民族的生产智慧,更承载着丝路各民族的生态适配与生产创新。作为丝路贸易的经济基础,成熟的蚕桑产业塑造了地方社会结构,突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成为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物质纽带,生动诠释了丝绸之路兼容并蓄、创新共生的文明特质。

2.2 丝绸之路的文化象征与多元认同

丝绸之路作为横贯东西方的交通命脉,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通道,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历史空间。鎏金铜蚕作为象征符号,凝聚了沿线各族对财富、交流与和平的共同向往,体现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价值。鎏金铜蚕首先完成了从艺术品到文化符号的象征转换。汉代工匠将青铜铸造与鎏金工艺相结合,使普通的蚕形器物升华为具有仪式价值的艺术品。这一转换过程体现了古人对物质文化赋予的意义,在陕西石泉出土的铜蚕中,其精确的九节腹节构造完全符合蚕的生理特征,不仅具有实用特征,还有艺术特征^[5]。

考古发现,此类铜蚕在丝路沿线呈现明显的形态变异。中原地区的铜蚕造型写实严谨,而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铜蚕则融合了健陀罗艺术风格,蚕体曲线更为夸张。这种变异正是文化适应的物质表现,物质文化在流动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此外,游牧民族还对铜蚕进行了创造性解读。在鄂尔多斯草原发现的匈奴贵族墓中,铜蚕与黄金饰品共同出土,表明草原精英将其视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这种差异的不同正体现了农耕文明强调铜蚕的生产性价值,游牧文化更看重其交换价值^[6]。

作为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鎏金铜蚕参与了丝路多元信仰的融合过程。在敦煌莫高窟第 296 窟的北周壁画中,养蚕场景与佛教飞天共存,暗示蚕桑生产已被纳入佛教宇宙观。其次,还有粟特人的蚕纹与圣火图案组合出现,形

成独特的“丝绸之路宗教图示”。最重要的史铜蚕在不同宗教体系中的性别象征差异。中原文化将蚕与女性气质绑定,如蚕花娘娘崇拜,而波斯细密画中却常将蚕描绘为胡须男子的形象。这种性别符号的转换,反映了文化传播中的意义重构。在这条辉煌的商品贸易之路上,同各个国家交流的不仅仅是商品货物。更重要的是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各国更加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拥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认同^[7]。

3 “一带一路”倡议下鎏金铜蚕的当代象征重构

这件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汉代文物,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郑重提及后,从学术殿堂走入公共视野,完成了从历史遗存到国家文化符号的深刻跨越。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实物见证,它不仅承载着两千年前中国丝绸产业的辉煌,更在当代语境中被赋予丰富的精神内涵,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纽带。

从历史维度审视,鎏金铜蚕体现了古代中国作为丝路起点的核心地位。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既依赖中原先进的丝绸生产,也离不开西南地区的织造技术与西域诸族的贸易保障。多民族协作共生的历史实践,使鎏金铜蚕超越了单一汉族农业文明的象征,升华为中华各民族共创丝路文明的共同记忆。这一认知转变,折射出当代历史叙事从单一民族贡献向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刻重构。在外交场域,鎏金铜蚕的文化价值被持续激活。从 2017 年国家大剧院展出,到 2023 年中国—中亚峰会以之为原型设计国礼,这件文物频繁亮相国际舞台,传递“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深厚底蕴,使之成为跨越语言壁垒、促进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有效强化了中国作为文明交融核心载体的国际形象。

当代语境下,鎏金铜蚕的精神内涵不断拓展。它既是指向国内五十多个民族团结共进的共同体意识载体,也涵盖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命运与共的发展愿景。从汉代陪葬品到丝路历史见证,从民族团结符号到国际交流信物,鎏金铜蚕实现了跨时空的身份蜕变。西安丝路金蚕广场的现代雕塑、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主题文创,将历史文化符号融入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持续夯实文化自信。实践表明,文化遗产的价值重估需立足历史真实,对接时代需求。它既传承了多民族协作共生的历史基因,又赋能新时代文化传播与国际合作,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这件千年遗珍的当代旅程,

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与包容性的生动注脚,彰显了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4 结语

往事越千年,在高速发展的现代,我们还得以透过一只小小的金蚕窥探到汉代的繁荣。正是人们对繁荣、财富、生生不息的渴望,又成为了贵族的陪葬品,彰显着男耕女织的国家政策。千年之后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沿线各国和衷共济、相向而行,共同谱写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共建成果。鎏金铜蚕的意义转换,揭示了一个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物质文化符号,必然具备多维度的意义承载空间。从经济象征到丧葬器物,从贸易见证到民族符号,铜蚕的每一次意义更新都是其内在属性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的结果。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变革的今天,这种古老而常新的文化符号,仍将持续为我们提供文明对话的独特语汇。其意义转化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历久弥新的生动写照。

参考文献:

- [1] 张维慎,张红娟. 鎏金铜蚕与秦汉关中蚕桑业[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3(06): 87-97.
 - [2] 汪源,汪建平. “鎏金铜蚕”的几条注释[J]. 北方蚕业, 2018, 39(02): 61-62.
 - [3] 雷钟哲. 丝绸、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共建[J]. 标准生活, 2017(06): 76-79.
 - [4] 张铁山. 丝绸古道上的艾德莱斯绸[J]. 中国民族, 2003(02): 9-11.
 - [5] 杨曙明. 鎏金铜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11-27(012).
 - [6] 刘冬梅. 汉藏文化交流史中的艺术品及其象征意义: 一件织锦唐卡的历史语境转换[J]. 民族研究, 2021(02): 122-136+142.
 - [7] 肖怀德. 从古丝绸之路到新丝绸之路——一种跨文化研究视角[J]. 西部文艺研究, 2023(03): 13-17.
- 作者简介: 刘莹(2000.03-),女,汉族,陕西宜川,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学。